

引 言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被称为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他“以世界级权威人士的身份，用一种无所顾忌的直率态度坦陈其内心的想法”^[1]。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观点和最为引发争议的观念就是亚洲价值观。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 1994 年 3-4 月号的《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集中表达了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并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李光耀这种‘无所顾忌’的‘直率’态度。采访李光耀的《外交》杂志执行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访谈录中这样写道：

李光耀与我以前遇到的政治家都不一样 没有寒暄 没有俏皮话，没有和颜悦色的笑容。他直盯着我——面无表情 但是目光锐利——握了握手，然后走向房间的一排浅蓝色沙发（他的新闻秘书事先已告知我应该坐在哪个位子上）。在半分钟令人尴尬的沉默后，我意识到不会有什么闲聊，于是掀下了录音机上的录音键：

扎卡里亚：随着冷战结束，许多美国人惊讶地听到越来越多对

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批评。这些批评源自东亚地区的精英人物，而这批人过去被认为是坚定的亲美派。在您看来，美国的制度出了什么错？

李光耀：告诉人们他们的制度出了什么毛病，这不关我的事。我的责任在于告诉人们，不要把他们的制度毫无例外地强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会。

.....²

正当人们将李光耀视为高举亚洲价值观的坚定旗手和捍卫亚洲价值观的顽强斗士的时候，2001年1月28日的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发表的一篇专稿爆出冷门 题目是：《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以下简称“《李》文”）文章一出，石破天惊。各种传媒纷纷以最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传播，^①并成为关心亚洲价值观的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和反对亚洲价值观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为了更好地了解李光耀的“放弃”兹将该文全文转录如下：

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

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没有哪一位“亚洲价值观”捍卫者比李光耀更加风光。这位近乎传奇的内阁资政曾把新加坡从一个蚊子肆虐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经济典范。

企图洞悉当时所谓的亚洲奇迹真伪的记者们曾定期登门造访李光耀，希望从他那儿得到有关亚洲经济为何表现得如此良好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他总是欣然从命 在《外交》杂志1994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采访录中，他就美国社会的失败给美国人上了一堂课。李说：“我们利用家庭来推动经济成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

^① 例如：《李光耀语出惊人 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李光耀令人惊奇的转变 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等等。

如今 李光耀的观点与以往有些不同。在 27 日一次有关亚洲的讨论会上，这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否定了他以前所说的许多东西。李用他在 1994 年使用的那种温和平静的语调断言，在全球经济的要求之下，“儒家”价值观——他现在爱用这个词——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李说，事实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亲——换句话说 把是否与某人熟识、而不是人们将如何处理资金作为投资依据。在其中的大多数国家中，投资流入数量只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的 40% 到 60%，而新加坡则已经得到完全恢复，“因为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标准”。李说，银行部门尤其如此，这一部门被迫采取了西方的财务公开制度。

李光耀观点的改变并不限于金融领域。他甚至对孝顺这一最受珍视的儒家行为准则也颇有微辞。他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他认为，信息技术成功需要“有风华正茂、充满活力和敢想敢干的头脑。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一度受到他严厉批评的美国范例。李光耀像顽童般地微笑着，谈起自己在达沃斯就餐时曾与计算机业巨子戴尔相邻而坐，当时他问戴尔，他是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 30 岁前跻身《财富》500 强的首席执行官。戴尔礼貌地回答说是 但他现在老多了 他今年 35 岁。李说 尊重学问是好的 但“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 做决定的是老人 他们行动迟缓 他们会错过机会”。

从文章内容看，作者是将“亚洲价值观”与儒家价值观联系起来说，等同起来讲的。说“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也就是说李光耀放弃

儒家价值观。那么，李光耀真的放弃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了吗？^①熟悉李光耀思想的人们难免心存疑问。为了准确把握李光耀的观点，有必要对《李》文认真加以推敲。



细读《李》文 联系李光耀的一贯观点及事后评说 笔者并不认为可以简单断言李光耀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这里，我们对《李》文的有关内容辨析如下。

一、《李》文指出：“李说 事实上 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李光耀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

严格地说，上述内容只是表明李光耀肯定了所谓的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经济透明和法治，但不能说明李光耀否定乃至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回顾李光耀对亚洲价值观与亚洲金融危机关系的有关论述，其观点可以归纳如下：(1)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的导因”是发生危机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制度不够健全完善，而不是被西方贬义化了亚洲价值观。李光耀说：“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几乎可说是社会病态的现象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 30 多年前，也就是 60 年代‘亚洲奇迹’一开始时就已经存在。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币借贷，不能自拔，才种下祸根。说穿了，过度借贷其实也不至于引发这么一场灾难，问题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体系不够完善，银行脆弱，监管

^① “亚洲价值观”也写做不带引号的亚洲价值观，都是 Asian values 的译称。笔者在本书中采用不带引号的亚洲价值观。有关阐释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点“亚洲价值观的不同表达”。

不严，推行了错误的货币汇率政策。文化上的陋习加剧了损害，又因为制度不透明，任何违法行为就益发难以觉察暴露，更容易瞒天过海。”³金融危机出现之后，李光耀对遭到金融危机打击的韩国朋友说：“你们不必为韩国的价值观道歉，你所须纠正的是你们的制度——你们做生意的制度，以及治理国家和政府的制度。”^{4①}（2）亚洲价值观并不一定会导致制度缺乏透明度。李光耀以新加坡为例说：“虽然拥有亚洲价值观，但我国的制度是完全透明的。”^{5②}（3）亚洲价值观有利于克服金融危机。李光耀说，儒家强调的社会重于个人的价值观，在韩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最困难时刻，充分展现了它的意义。“韩国人民当时排队捐献金银首饰和其他个人财宝来解救国家，以使国家免于破产。”他指出，尽管这些努力无法非常有效地解决韩国严重的经济问题，但韩国社会所表现的团结和活力，却赢得世人的尊敬，从而鼓励外商更看好韩国的前景。李光耀相信，当这个地区开始复苏时，儒家所鼓励的勤劳、节俭、为未来牺牲奉献、重视教育和学习等美德，将促使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复苏得更快。而且，“亚洲式资本主义最终必定能克服经济危机。”⁶

二、《李》文指出：“李说，……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亲——换句话说，把是否与某人熟识，而不是人们将如何处理资金作为投资依据。”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李光耀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

有关资料显示，早在 1998 年 5 月，当记者问及亚洲价值观为东亚带来发展，但它是否也会导致东亚衰落的问题时，李光耀说：“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儒家价值观被贬低。我指的是对朋友和家人的义务。你必须照顾你的家庭和大家族，对朋友忠诚支持。当然，在对朋友和家人尽义务时应该自掏腰包，而不是挪用公款。一旦政府势力减弱，贪污的

① 李光耀所说的韩国价值观，也属于亚洲价值观。

② 新加坡强调机会平等、制度透明。例如，新加坡的银行不根据贷款者属于同一个经济财团而提供贷款，政府要求银行公布本身的所有坏债以及它们在哪些国家蒙受损失，因为股东和市场都想知道银行在各国借出多少款项。这就是说，制度透明已经是新加坡制度的本质特征。因此，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新加坡银行没有受到太严重打击。

情况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就有动用公费来尽个人义务的情况出现。这是错误的。”⁷1999年10月，李光耀进一步指出，儒家学说和价值观常常被人歪曲。儒家要求个人照顾家庭，但是这不应该理解为鼓励滥用个人的地位，牺牲公众的利益。“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的‘小人’行径，是直接违背儒家思想的基本道德准则的。这种脱离常轨的行为必须加以纠正。”⁸；而在2000年9月15日出版发行的《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李光耀更为明确地指出：“西方论调其实都贬损了儒家价值观。儒家君子对家庭的义务，对朋友的忠诚，设想的纯粹是个人的施与，而不是假手官方资源。”⁹总括上面的论述，李光耀的有关思想可以归纳如下：（1）儒家价值观肯定积极履行对于家庭和朋友义务的君子作风；（2）儒家价值观反对在行使对于家庭和朋友义务时的假公济私的小人行径。（3）采用假公济私的方式关照家庭和朋友，就由儒家所肯定的君子沦为儒家所否定的小人。因此，《李》文所说的任人唯亲的现象并非儒家价值观肯定的行为，而是儒家价值观否定的做法；并非奉行儒家价值观引发的结果，而是歪曲儒家价值观带来的恶果。

三、《李》文指出李光耀“甚至对孝顺这一最受珍视的儒家行为准则也颇有微辞。他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他认为，信息技术的成功需要‘有风华正茂、充满活力和敢想敢干的头脑。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李说，尊重学问是好的，但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李光耀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

儒家文明产生、发展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的后喻文化，因此，儒家所珍视的孝顺往往演变为对于长辈的无条件的顺从；当今社会属于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往往要向后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它必然要求人们对那种无条件顺从长辈的旧式孝顺加以改进与创新。这种改进与创新并非要否定孝顺的核心价值而是要创新孝顺的具体形式。同样，李光耀对孝顺的“微词”也绝非要对孝顺加以否定或放弃，而是要对孝顺加以改进与创新。实际上，李光耀对待儒家所珍视的孝顺的态度，就如他对待儒家所强调的“五伦”

的态度一样。李光耀说：“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¹⁰同样，对于孝顺的改进与创新，也就是要给予孝顺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前喻文化不断变革的时代特征。

四、《李》文中似乎最能说明李光耀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的一段文字是：“李用他在 1994 年使用的那种温和平静的语调断言，在全球经济的要求之下，‘儒家’价值观——他现在爱用这个词——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笔者认为，这也不足以说明李光耀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

根据李光耀的一贯思想，《李》文转述的李光耀说儒家价值观差不多过时了的观点，应该理解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而不应该理解为李光耀已经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实际上，2001 年 1 月 28 日与《李》文发表同一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发表的题为《李资政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说》的报道更为准确客观地报道了《李》文所报道的情况：“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如果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些价值观就必须加以改进。”这里，“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不等于整个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这些价值观必须加以改进”不等于这些价值观必须加以放弃。紧接上语，李光耀还说：“虽然没有任何一套价值系统是可以永远合乎时宜的，一些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却应该是所有人类文明中都永恒存在的特点。这就实际上在指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的同时，又强调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永恒存在’。”事后的 2001 年 1 月 30 日，当记者向李光耀提及“《新闻周刊》最近的一篇网上报道宣称他在亚洲价值观的立场上，‘放弃原来的主张’”的观点时，李光耀笑着说：“这是西方式的新闻处理方式。他们用标题来引起注意，如果你仔细阅读字里行间的意义，就会知道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认为我放弃原来的主张。”¹¹

早在 1999 年 10 月，李光耀在会见过曾在《外交》杂志撰文批评自己维护亚洲价值观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之后，曾以总结的语气告诉记者：“我们两人（指李光耀本人与金大中——引者注）都 70 多岁了，金大中

的观点是由他的人生经历塑造出来的，而我本身也 76 岁了，也应该不会改变世界观。双方已经提出了各自的立场，至于谁对谁错，就由历史来判断。”¹²当然，变与不变都是相对而言。一方面，“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¹³所以，那些反映了人类社会总体性特征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继承；另一方面，“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¹⁴所以，那些只反映人类社会阶段特征性而经不起时代考验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又需要改进、创新。李光耀说得好：“我们不能始终一成不变，但也不能完全改变。”¹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的观点更正如下：李光耀既没有完全放弃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也不是要全盘继承儒家价值观，而是要在坚持、继承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不断改进、创新儒家传统价值观。

三

就坚持、继承儒家核心价值观而言，李光耀是一位深沉的保守主义者。^①李光耀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坚持与继承，根源于他对于传统的亲切的了解。李光耀说：“所谓传统，是指一个民族铭记和保存祖先经验结晶的一种方法。”¹⁶传统的由来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相似，也就是在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中，适者生存。”¹⁷传统之为传统，是“因为它

①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主义并不等于顽固守旧，而是反对李光耀所否定的那种“以为好头脑就能设计更好的制度，创造比历史演化或经济达尔文主义所能建构更多的‘社会正义’的‘非常不智’的想法，反对那种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保守，可以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点“有所革新，有所因循”和第三章第四节中的有关论述。另外，Hearnshaw 在《英国保守主义》一书中指出保守主义有 14 个特征：1. 尊重过去的传统；2. 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3. 自治体的联结；4. 制度具有延续性；5. 反对革命；6. 谨慎或渐进的改革；7. 国家以宗教为其基础；8. 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来自神圣的渊源；9. 义务对权利具有优先性，即义务优先原则；10. 群体与个人一样重要；11. 对国家的忠诚；12. 强调国民的共识；13. 现实主义的态度；14. 实践性的政治。（转引自蒋庆：《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见《原道》第 6 辑第 8—9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笔者认为，李光耀不仅具有“尊重过去的传统”的保守主义特征，也具有保守主义的其他多个特征。

建立在一种久经磨练和考验的价值观念制度的基础上”¹⁸。

根据李光耀的上述观点，传统的意义可以归结为如下两方面：一方面，传统是一代又一代的无数前人的集体经验的积淀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传统的可靠性就要胜过少数天才的头脑，甚至于也要胜过于、两代人的“革命性”创造。轻视传统，也就是轻视历史，轻视形成、绵延了这些传统的民众，甚至于也等于反民主。因为没有什么观念意见比传统所能代表的人数更为众多，所反映的民意更为广泛。轻率地抛弃传统，只能将自己归于愚昧；彻底地砸烂传统，只能使社会倒退到没有文化的荒蛮世界。另一方面，传统又是一次又一次的物竞天择的结果。它是经过了无数次试错考验之后适者生存的“战利品”。因此，传统不是人为而成，而是自然天成。从这一意义上说，传统与自然具有相似性。实际上，传统就是一种文化自然（相对于宇宙自然）。尊重自然，也就应该尊重文化传统；尊重传统，也就是在尊重文化的自然。以下故事说明了尊重自然（也即尊重传统）的重要性：在某个生存着许多鹿和狼的孤岛，人类为了使鹿免遭狼的捕食而更好地存活，便将岛上的狼捕杀一尽。在狼尽之后的最初几年，鹿确实因为狼的消失而日益增多。但是，再过若干年之后，孤岛上的鹿却慢慢减少，乃至完全灭绝。究其原因，是因为狼的存在往往使病弱之鹿遭到捕食，客观上对鹿种起到了一种择优汰劣、相反相成的作用。当狼消失之后，病弱之鹿也就得以存活，并且将造成病弱的基因遗传以至于扩散，最后导致了鹿的劣化乃至绝种。这则故事给人的启示是：“人算”不如“天算”。历史的教训已经正告人们，片面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就难免干出“围湖造田”、“垦草造田”的蠢事，并最终遭到洪水泛滥、草原沙漠化等的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同样，片面强调“打碎”传统、抛弃传统，就难免演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的闹剧乃至悲剧，并最终走到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荒漠。今天，在吸取了与自然“交手”的惨痛教训之后，人们已经变片面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为尊重自然、亲和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此类推，在吸取了与传统对抗后的血的教训之后，人们也应该变片面强调“打碎”传统、抛弃传统为尊重传统、理解传统，从传统走向未来。李光耀指出：“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比

较优越，不过这不足以构成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取代具有几千年历史，而且根深蒂固的中国和印度传统文明的理由。西方人如果认为他们所具有的价值观更优越，他们必须拿出更好的成绩来证明这一点。”¹⁹面对儒家传统的丧失，李光耀深感忧虑：“改变在所难免，我们还是必须设法保留我们基本的核心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使中国文明成为世界持久的文明。”²⁰如果我们彻底地改变，以致丧失了一度保障我们的社群得以生存的品质，又怎么知道英美文化那种散沙式的生活态度能保障我们的生存呢？我认为那样我们是无法生存的。”²¹因此，“我们必须对年轻一代循循善诱，把久经考验的、有力的核心价值观灌输给他们。”²²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那些久经考验的、有力的核心价值观，李光耀十分重视家庭、节日、语言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载体对于传统的传承作用。^①他强调：

① 李光耀十分重视如下载体对于传统的传承作用：1、家庭。李光耀认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是价值观的形成之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通过父母灌输给子女的。儿童的可塑期很重要。根据天主教会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孩子交由神职人员照顾到 12 岁，一般来说，这个孩子会终身信仰天主教。李光耀特别强调不能让孩子仅在电视机前长大或仅靠保姆带大，而必须要靠父母、祖父母的言传身教。因此，新加坡政府通过许多具体措施鼓励三世同堂，维持大家庭制度。2、节日。李光耀特别重视岁时节日。他强调：“确保国人奉行和庆祝一些主要的节日。这些盛大的庆典能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些庆典节日使我们回忆过去，使我们和祖先的历史认同。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 5000 多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第 424 页）3、语言。李光耀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有过这种体验”：“会讲华语，同时又看得懂华文，能使人产生自信。……只有那些不会讲华语、又不懂华文的新加坡人，在国外受窘或被人嘲笑之后，才能体会那种感到不足和失落的心境。”因此，华语、华文的“心理价值是可以一再强调的。家长们希望孩子出人头地。他们也要孩子保存忠、孝、仁、爱的华族传统美德。通过华语，他们的孩子可以在感情上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部分。这种文明源远流长，因为它建立在一种久经磨炼和考验的价值观念制度的基础上。”（《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第 420 页）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重新陷入“那种感到不足和失落的心境”，李光耀让他们从小读华校，学华语。从而增强了他们坚持传统、抵制“西风”的能力。1971 年，李光耀的大儿子李显龙赴英国读书。当时，英国大学的学生都长发披肩。在每个人都长发披肩的一所大学里要剪短头发，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李光耀并没有向儿子谈过是否应该留长发。他只是等着看事情会怎样发生。等了半年、一年，李显龙寄回了自己外出读书时的照片。照片中的李显龙仍然留着短头发。李光耀认为这很不平常，因为在全（下转第 11 页）

“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23①}

四

就不断改进、创新儒家传统价值观而言，李光耀又的确是一位异常活跃的文化传统的革新者。在李光耀看来，传统文化既然是在以往的历史中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逐渐形成，文化传统也就应该能

大学一万个学生当中，可能仅有他是短头发。五年后，李显龙的弟弟也去英国读书，一年后寄回照片，也是短头发。儿子的这种表现，李光耀认为是因为他们持有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我就是我。我是来学你们的科学、你们的工艺，以及你们怎样突破工业生产而进入工艺时代。我并不是为了要留长头发，穿肮脏的牛仔裤，赤着脚走路，穿那些印有古古怪怪的口号的汗衫而来。这些东西跟你们在太空上的成就毫无关联。”（《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第 390 页）当然，这并不是说，掌握了一种语言，你就自然地吸收了它的价值观念，但大体上会有帮助。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适应现代潮流和避免种族矛盾，新加坡实际上是以英语作为自己的工作用语。由于许多新加坡华人难以兼通两种语言，李光耀也主张用英语来教导儒家思想，只有主要的词语才用华文原文。李光耀认为，虽然掌握华语更有利于吸收中华文化，但是，这不等于不用华语就不能吸收中华文化。例如，韩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

4. 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李光耀指出：“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传播，有许多是靠父母讲给孩子们听，还有许多是靠那些在不久之前还有的，在街边摆摊讲故事的人传播的。在有电视之前，有才华的艺人在丽的呼声广播，每星期分段向成年人和孩子们讲个动人心弦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所讲述的是华人古代半历史半夸张的忠臣与奸贼、圣贤与弄臣、文相与武将、懦夫与蠢材。孩子们在他们最受影响的时期，就在街边书摊，花几分钱租来连环图书里，阅读这些人物。”李光耀认为：“故事本身就十分引人入胜。故事里又含有精神道德的教训。这正是文化的精华所在。”（《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第 395—396 页）

李光耀接着说：“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日本转变成了工业社会，同时却在人际关系方面保持了纯粹日本式的东西。他们既获得了工业化，又保住了世袭的价值观。”（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

在今天乃至未来根据同样的规则继续演进。实际上，传统形成于过去，却不限于过去，而是流动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一种过程。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就不是过去，而是现在与未来。李光耀说：“基因不能凭空创造，对吧？当然，如果你一直摆弄它，也许将来有一天做得到。但你现在就可以摆弄文化。改变来得很慢，但透过经验，这是可能的，否则人类不可能生存至今。如果某些习惯对求生没有帮助，你最好赶快把它革除了。所以，我们必须尝试，让新加坡人养成某些有助于新加坡成功的习惯。如果你表现得像个意大利人，到处混混，优哉游哉，把行李推来推去，就不可能经营出一个足以跟世界其他国家竞争的好机场。你必须加紧脚步，……快点把行李处理好！若你在 1960 年代到过新加坡机场，现在再来，就会发现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个地方和这儿的人都不一样了，效率更高了。”²⁴

作为文化传统的革新者，李光耀注意根据不同性质对文化传统给予区别对待。一方面，对于那些经不起时代考验的文化传统，李光耀毫不犹豫地加以革除和摒弃。例如，“儒家伦理在父权社会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应该改变。”²⁵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化传统，也要根据时代变化给予适当的转型与创新。李光耀说：“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²⁶因此对于儒家“五伦”等传统观念，我们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不容许这些关系沦为裙带风或偏袒行为，以致破坏我们的任人唯贤制度。”²⁷这里，李光耀所说的“给予……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就是要对文化传统给予创造性转型。同时，“今天的政府，不再由封建王侯掌管。政府的职权范围也已经扩大了。因此，君臣有义，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定位。”²⁸这里李光耀所说的“重新定位”就是要对文化传统进行转换性创新。

作为传统文化的革新者，李光耀强调适应不同时代对文化传统采取不同态度。一方面，当新加坡进入消费时代，年轻一代面临着丧失传统而走向颓废的危险时，李光耀更多强调传统的坚持与继承。1979 年，李光耀在以“加强双语维护传统”为主题的致函中指出了传统对于

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意义，即是否保有传统，关系到年轻一代“是否能规规矩矩地生活、工作、彼此竞争和合作？是否效忠和爱国？他是否在必要时能成为一个好的军人，准备捍卫国家、保护妻子儿女，以及他的同胞？他是否孝顺父母、敬老尊贤、奉公守法、知人情、懂世故，而又有责任心？他是否照顾妻子儿女和父母亲？是不是一个好邻居、一个可靠的朋友？他是否能容忍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新加坡人？他是否清洁、整齐、守时以及彬彬有礼，’²⁹等等。但是，即使在强调传统的坚持与继承的时候，李光耀也仍然不忘提醒国人：“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必须抛弃东方蒙昧主义与迷信的想法与惯例”，在“加强并巩固所有亚洲人社会中都具有的各种传统家庭联系”的同时，“必须避免由这种提拔亲戚朋友观念所经常产生的裙带关系作风，’³⁰。另一方面，当世界进入信息时代，新加坡社会因缺乏活力而迫切需要“创业文化”的时候，李光耀强调更多的则是对文化传统中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東西给予革除与摒弃。2002年2月5日，李光耀在“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发表的以新加坡的创业文化为主题的演讲中指出，在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士农工商是华人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其中，商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不事生产。直到今天，华人的通俗文化里还有这种等级观念。而以儒家思想称道的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这样的社会不愿接受改变，也就无法激发工业革命和孕育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长久以来，才智过人的中国人都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也采纳了这样的制度和价值观。“直到今天，中国、日本、韩国的许多一流大学的杰出学生，都选择在政府里服务，而不是到企业界发展。新加坡的情况也是如此。结果，在这些国家都没有强劲的企业文化。”³¹相反，美国社会没阶级之分，人人都想发财致富，整个社会充满创造财富和创业的动力。李光耀说：“在过去10年，当我看到美国经济重整旗鼓，收复了它在80年代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强力竞争下失去的市场，我彻底地领悟出美国人所倡议的创业精神是怎么一回事。”³²他认为，美国人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创业失败后还不断尝试。

这就是美国经济动力的源泉。因此，“政府要告诉人民的是，如果你攀登事业的高峰，你就必须冒险。如果你失败了，你必须再尝试。事实是，在新科技时代，失败不是值得羞耻的事，这种观念在世界都经得起考验。”³³面对时代变化，白发年迈的李光耀再一次向那些比他年轻许多的新加坡人大声疾呼：“世界已经改变了 我们也必须改变。”³⁴

五

改进、创新儒家传统价值观与坚持、继承儒家核心价值观并不自相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实际上，李光耀一直维护、奉行和倡导儒家核心价值观，并反复强调儒家价值观促成了新加坡乃至东亚的经济腾飞和发展：

一、儒家价值观促成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发展。李光耀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 特别是 1959 年到 1969 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 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 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 我们是无法克

① 需要指出的是，适时而变，勇于革新，不仅是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的一贯作风，也是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吴作栋反复强调的品质。这一点，在“9.11”事件之后表现得尤为显著。面对全球化、电信信息科技、生物学以及宗教原教旨运动带来的世界巨变，吴作栋在 2002 年的新年献词中强调：“新加坡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个不同且更不可预测的世界。因此在未来数年里 新加坡 关键性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打造新加坡。”（《总理新年献词全文》，2001 年 12 月 31 日《联合早报》电子版）为了“重新打造新加坡”，吴作栋提议并正式成立了“改造新加坡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辅助由李显龙副总理领导的经济检讨委员会，为新加坡的未来提出一个更全面的发展策略。经济检讨委员会着重的是经济策略，改造新加坡委员会则将着重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是新加坡政坛的新秀。他们都是在 2001 年大选后被委任为政务部长。这个高层委员会分成五个小组委员会：激励创业小组、爱国意识小组、族群融洽小组、精神建设小组和发展协调小组。委员会所追求的是三个目标：“改变，集思广益，以及可行的建议。”领导经济检讨委员会的李显龙副总理曾说，要翻看经济领域“每一块石头”，并积极作出改变，“如果最终的建议是原封不动，我想我们就浪费了时间。”新加坡人相信，“改造新加坡委员会”也将把“每一块石头”翻遍；一些石头可能必须放回原位，一些则可以调整位置，甚至去除。经过第一轮的内部讨论之后，“改造新加坡委员会”决定以他们认为新加坡青年最热衷于追求的“5Cs”为突破口。这“5Cs”指的是理想的职业（careers）、共管公寓（condos）、私人俱乐部会员证（clubs）、信用卡（credit cards）和汽车（cars）。委员会认为这些都是新加坡人一生追逐的梦想。

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的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³⁵又说：“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 50 到 70 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我本身有了这种体验，所以我很重视维护华族新加坡人的文化价值观。”³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表明：“国家的历史也促成了它们社会内部强大的结合力，他们吸收了这样一个宝贵教训：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进展 全国上下必须步伐一致 共同迈进 其中的含义是 个人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进步做出牺牲。个人可以期望最终从群体成功中获益而感到满足，这点已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³⁷李光耀举例说，1985 年，新加坡正经历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过了 10 年接近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之后 新加坡于 1985 年却面对 1.6% 的负增长。政府劝说工会和工人接受减薪和节制工资两年。政府向工人和工会解说，新加坡必须恢复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否则 新加坡将不能避免裁员 也不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工人接受了做出牺牲的号召。工人所做的牺牲，是促使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从 198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负数增长率提高到 1987 年 9% 的增长率的最主要因素。李光耀说：“那些在较低层次工作的人们 他们勤奋、节俭、有惊人的耐力、灵敏 并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 尤其是组成人口大部分的华人。如果我们有的是英国类型的劳动力，那我们就会不会成功。我们有的是新加坡类型的劳动力，创造出成绩。”³⁸

二、儒家价值观促成了东亚的经济腾飞和发展。①李光耀说：“东亚

① 吴作栋也说：“促进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正面文化价值观是‘儒家思想动力’。这是指不包括那些妨碍革新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好的一面 其中包括节俭、毅力、合群和长幼有序等优良价值观。”（《勿因方便与经济价值抹煞亚洲文化传统》，1991 年 7 月 27 日《联合早报》）杜维明则这样指出：“东亚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比方说，利己主义或者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重视。与此相反，重点却放在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以及合作这些因素上。而且，教育大受重视。引人注目的事实是 这样一些价值 恰恰正是 60 年代被认为是现代化有危害、或是与之水火不相容的那些价值。如今，这些价值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作是对东亚很多地区成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重要因素。”

文化所拥有的价值观——例如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群策群力，正是国家快速发展所需要的支撑力量。”³⁹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显示：“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有助于国家推行工业化。家庭的推动力，通过奖学金、通过勤奋工作以及通过集体协作来给家庭带来荣誉的热切要求，是促使一国人民接受教育，学习科学与工艺的重要因素。”⁴⁰ 创造了整个亚洲经济成功的“最基本原因是在于这里的人民，他们守纪律，重视教育——尤其是数理和工程——并且也有高储蓄和高投资的文化习俗，辛勤工作往往是为了下一代。然后这里的工业化进程也迅速伸展开来”：先是日本 然后是亚洲‘四小龙’等等 然后是中国、越南。“这是一层层推进的”，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在接下去的二三十年，人们会看到非常高的增长率。中国、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方会冒出几十个——如果不是好几百个的话——像台北、汉城、高雄、釜山这样的城市 在沿海或沿着河流的地带兴建起来。⁴¹①

六

李光耀关于儒家价值观促成了新加坡乃至东亚的经济腾飞和发展的观点 与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西方资本主义之途演进的论题发生了矛盾。韦伯的论题可以分解为如下三个步骤^②：

一、就‘物质的’条件而言 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因此，结构上的特性并不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二、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

① 需要指出的是，李光耀虽然对东亚前途抱乐观态度，但并不认同 21 世纪是“亚洲世纪”的说法 只是认为亚洲在 21 世纪将扮演更重要角色。针对有人提出的 21 世纪是“亚洲世纪”的观点，李光耀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对这个被讲得天花乱坠的‘亚洲世纪’有太高的评价。不过，亚洲在新的世纪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真的。因为中国越来越重要。”《亚洲国家能解决问题以更强实力卷土重来》，1997 年 12 月 5 日《联合早报》）

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三、道教，作为异端的主流，因为本身的彼世神秘主义与巫术的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的传统主义把持住它支配的地位，连同士对经济生产经营的兴趣缺乏，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西方资本主义之途演进。

李光耀与韦伯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似乎各有合理之处，但又各有存疑之点：一方面，如果说，儒家价值观促成了新加坡乃至东亚的经济腾飞和发展，那么，为什么儒家价值观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之前，又迟迟没有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如果说，儒家伦理也即儒家价值观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西方资本主义之途演进，那么，为什么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偏偏是在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不是在别的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腾飞？^①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说，韦伯所阐明的“儒教对于世界所采取的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可以将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又相互统一起来。^②一方面，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① 刘军宁也提出并回答过相关问题：“儒教是不是在任何经济体制下或社会形态下都有碍于现代化？假定农业社会下的儒教有碍于现代化，那么，工业社会下的儒教是否也有碍于现代化？假定计划经济下的儒教有碍于现代化，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儒教是否也有碍于现代化。其次，假定政治化的儒教有碍现代化，那么，世俗化的儒教是不是也有碍于现代化？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分开来回答，而很难笼统地说儒教有碍现代化。事实上，有一点似乎已经得到公认，即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曾被视为现代化障碍的儒教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东亚现代化的动力。”

② 一方面，严格地说，说“儒教对于世界所采取的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并不完全正确。儒家文化也强调改造和进取，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和“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时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多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等。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说“儒教对于世界所采取的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也不无一定道理。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前者似乎更多地强调对世界采取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后者似乎更多地强调对世界采取改造而不是适应的态度。